

雍正手书《金刚经》及其佛教中国化实践特色

刘 军

内容摘要：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系其亲手抄写为母亲祝寿的写经作品。以手抄经书的方式为母亲祝寿，是其孝心的独特表达，也是当时佛教备受尊崇和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具体体现。该作品反映了佛教孝道思想与儒家孝文化的融合，反映了佛教弘法方式、供养方式、修行方式，以及佛教经书材质与装帧方式的中国化。它所传达的孝亲感恩思想，对新时代孝文化的传承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它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之美，是书法艺术家和爱好者不可多得的范帖经典。雍正的写经祝寿之举，也为当时和今天的佛教四众弟子传播正法、正信正行树立了榜样。

关键词：雍正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佛教 中国化

作者简介：刘军（1965—），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雍和宫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雍正，本名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是康熙第四子，清朝第五位皇帝，年号雍正，庙号世宗。他在位13年，是“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的一代帝王，同时也是一位佛教居士和书法家。他曾先后两次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父母祝寿。第二次手书作品，即本文之研究对象，现为北京市佛教协会（广化寺）收藏珍贵古籍文献之一。

该经书系雍正为母亲祝寿的礼品和传世不多的写经书法作品。本文从该经抄录的背景、目的及自身特点出发，总结梳理其所体现的佛教中国化状况，探讨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基本情况与抄写背景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绢本、墨书、经折式平开册页装。封面和封底为黄底卍寿纹锦面木夹板，封面题签黄底黑字，上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经书共 39 开，首开为工笔重彩佛画释迦说法图，第二开为净口业真言、发愿文和开经偈，之后 35 开 70 页为行楷书法经文正文，每页有 7 行字，每行约 12 字。第 38 开为金刚心真言、补阙真言和款识：康熙五十八年岁次己亥三月十九日，妃母六旬华诞熏沐庆祝，千秋斋书，和硕雍亲王男胤禛，下钤“胤禛之章”红色印章。最后一开为韦陀及四大天王护法像。

雍正生母乌雅氏，生于顺治十七年（1660），满洲正黄旗，护军参领威武之女，康熙十二年（1673）入宫，康熙十七年（1678）在紫禁城永和宫生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康熙十八年（1679）晋封为德嫔，康熙二十年（1681）晋封为德妃，故此抄经款识曰“妃母六旬华诞”。

雍正自幼从学于著名学者张英、阎若璩、顾八代等人，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工诗词，善书画，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素养，而且崇儒重佛，喜欢研读佛家典籍，深通佛理。尤其对中国佛教代表性宗派禅宗，更是深得法要，别有慧解。自称“少年喜读佛典，成年更事研经”，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还亲自写经、编著佛教语录。其佛学修养与造诣在古代帝王中几乎无人能及，影响很大。所以，乾隆在《雍和宫碑文》中曾赞颂他说：“我皇考向究宗乘，涅槃三昧，成无上正等正觉，施洽万有，泽流尘劫。帝释能仁，现真实相。群生托命，于是焉在。”可以说，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对雍正个性修养、处世哲学、治学之方乃至治世之道都有很大影响。

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他还在雍和宫做亲王时，为了祝贺父皇康熙 60 大寿，亲手抄写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母亲 60 华诞之际，他再次亲手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母亲祝寿。以手抄经书的方式为父母祝寿，是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反映，是其孝心的独特表达，也是当时整体社会文化氛围，尤其是佛教备受尊崇、盛行于宫廷内外的客观体现。

二、从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看佛教中国化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一部个人写经作品，是一个儿子奉献给母亲的生日礼物。但今天看来，这件既普通又不同寻常的作品，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当时佛教中国化的状况，即佛教传入我国后，充分发挥其圆融中道、契理契机的大乘精神，随着时空因缘变化而不断进行自我调适、自我革新，主动适应中国社会、融入主流文化，最终与中华文化高度融合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华文化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智慧与胸襟。

(一) 抄经祝寿——佛教孝道思想与儒家孝文化的融合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首先反映了佛教孝道思想与儒家孝文化的融合。在佛教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孝道思想都根深蒂固，尤其是对父母行孝是二者孝文化的核心。佛教源自印度，其孝道是“出世之孝”。在《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中，释迦牟尼重点从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来论证对父母行孝的重大意义。佛典中一再强调知恩报恩和因果报应思想，认为父母养育子女之恩广大无边，若背恩不报，不孝顺父母，将来会堕入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去受苦。若孝顺父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将会得到诸天护持，来生福乐无穷，避免进入“恶道”，甚至能跳出六道轮回，进入菩萨或佛的永不生灭的境界。而儒家的孝道是“入世之孝”，主张“百善孝为先”。《孝经》说：“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人伦，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教化的泉源。孝文化最早是作为家庭伦理规范而存在的，主要调节的是亲子关系，具有归亲、继亲、养亲、敬亲、顺亲、谏亲、侍亲、葬亲、祭亲等丰富内涵。尤其强调对父母行孝敬养要做到“五备”：“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也，然后能事其亲。”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为了立足和发展，在处理孝道问题上采取了调和与会通的策略，大力弘扬孝道，一方面以儒道之言佐证佛教之理，从理论上论证“出世之孝”与“入世之孝”不相违背，另一方面不断走向世俗化和伦理化，达成了其孝道思想与儒家纲常的融通与契合。中国佛教承认在家之孝理所当然，认为父母也是自己的佛菩萨，孝养父母，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天经地义，强调“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同时重视出家的“大孝”，认为只有出家或在家精进于佛法的闻思修行，最后证得解脱的佛果，才能更好报答父母的恩德，才能自度度他，利益人天，帮助父母及无数的众生从轮回苦海中解脱，实现“法性之养”和精神救渡。在具体实践方式上，佛教认为，书写、诵读和讲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无量寿经》《地藏王菩萨本愿功德经》《药师经》等经典，是感恩报德的最好方式，是为父母、师长等祈祷消除灾难、增长福报、增延寿命、成就心愿的重要途径。^①书写之时，态度虔诚，甚至斋戒沐浴，以金、银泥，或以香汁和墨书写，还有以血书写经典显示其至诚之心的。雍正为母亲抄录《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可能也是基于这一理念。

在中国孝文化中，为父母长辈祝寿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古人追求“五福”：“一

^① 牛安生：《孝文化：儒家和佛教的比较及启示》，学习论坛，2012（2）：62-63。

曰寿，二曰福，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居五福之首，为老人祈福求祥，盼望寿运长久，由此形成祝寿风尚。中国古代使用干支纪年，六十年一个轮回，称为一个“甲子”。一个人活过六十岁，代表着要进入下一个轮回，寓意新生，古代人对此都非常重视。因此，祝寿即俗称的“过生日”，一般从六十岁开始，平常为小庆，逢十如七十、八十、九十等，为大寿，要大庆。晚辈们要提前精心筹划，准备礼物，备办宴席，布置寿堂，上起天子下至庶人，无有例外。清代宫廷对帝后六旬万寿尤为重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甚至规定元日（元旦）、长至（冬至）和万寿圣节（万寿节）为三大节日。

佛教很重视诞辰日，很多佛教节日实际上就是各个佛和菩萨的诞辰日。如佛教最重要的节日四月初八佛诞节是释迦牟尼诞辰的日子，正月初二为弥勒圣诞，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二月二十一普贤菩萨圣诞，四月初四文殊菩萨圣诞，等等。对父母而言，佛教认为，过生日是母亲的苦难日，在这天应该要孝顺侍奉母亲，最好的方式是多做功德利益众生，可以以抄写经书、助印经书、布施供僧、诵经礼忏等方式，祈求佛祖保佑，以此功德回向父母，为父母祈福延寿，长养慈悲。如《金刚经》第十五品“持经功德品”说：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具有殊胜功德：增长福德、断除烦恼、消除业障、开发智慧、成就无上佛道。弘一法师稽古观心，更全面地总结了潜心抄经的十大功德利益：消灭免罪；常得吉神护佑；夙世怨对永得解脱；恶鬼猛兽不能为害；身心安稳康泰；衣食丰足福禄绵长；所言所行人天欢喜；愚者转智病者转健；勇离恶道受生善道；能为一切众生种植善根，作大福田，直至三慧宏开，六通亲证，速得成佛。

雍正作为信佛崇佛之人，深谙此道，以抄经功德回向母亲，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实际上，在此之前的康熙五十三年，即康熙皇帝60寿辰之际，他就曾以“破尘居士”之名亲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父亲祝寿祈福。两件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堪称为父母祝寿的姊妹篇。作为历史的见证物，它们承载了佛教与儒家孝道伦理的对话交流，以及出世的佛教伦理与入世的儒家血亲伦理的会通与融合。

在现实生活中，雍正也秉承“仁孝”治天下的传统，颇重孝道，故其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中有“大孝至诚”之说。当然，关于雍正与其生母的关系，历来有种种传说，但即便真实存在，也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所造成。在继承大统之后，他千方百计回报母恩。在母亲病重之日，亲至永和宫，昼夜侍奉汤药，极尽孝道。母亲去世后，他还赋诗多首怀念母亲，表达追思与怀念之情。

（二）传抄经书——佛教弘法方式的中国化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还反映了佛教弘法方式的中国化。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始终是与弘法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唐惠能《坛经·行由品》：“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遯。”佛经讲，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绍隆佛种、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是佛子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弘法为家务，利生是事业，因机弘法，因人施教，是佛教弘法的重要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环境条件下，弘法的方式和途径也多有不同。

口传面授是佛教早期弘法传播方式。口传方式，即由僧尼开坛讲经，宣说佛法传播给广大民众。释迦牟尼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后的45年，就是游历各地向各阶层讲说法，传播佛法智慧。直到公元前1世纪之前，口传方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弘法方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走入人群，随机施教”，也是历代大德所遵循的重要弘法原则。

文献传播方式，即书面方式或称写经抄经弘法方式，是口传弘法方式之后的另一种重要弘法方式。公元前1世纪左右，以贝叶为载体的刻写“贝叶经”应运而生。贝叶经成为佛教弘传历史上最原始的记录媒体和书面弘法方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翻译经典、抄写佛经的弘法方式得到进一步拓展。

抄经，古称写经，就是用最虔诚、最恭敬的心把释迦牟尼说的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东汉时期，已经开始翻译佛经，译成之经文直接以笔墨书写记录下来。之后，因传扬流布之需要，复将译文辗转抄写，由此写经之风大为盛行。从六朝以后各朝代都有很多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包括出家僧侣和帝王、官吏、宫人、士大夫、平民等在家居士，为了弘扬和传播佛法而写经，大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据统计，自魏晋六朝至近代，我国高僧大德中善书者代不乏人，有文献可征证的僧侣书法家就有450多人。^①敦煌出土的《譬喻经》一卷，即为东魏甘露元年（265）之写本。唐代净土宗善导大师曾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至今仍有传世之本（新疆出土）。据唐代智昇《开元释教录》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67）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译及手抄各类佛教典籍总计2278部、7046卷。^②两晋隋唐时期甚至出现了专门抄写经书的“经生”和“写经体”书法。唐高宗李治还曾敕令宫廷秘书省、弘文馆抄写《金刚经》《法华经》等佛家经典，分发至全国各道县都府。

① 邱明强：《中国书法与佛教文化漫谈》，2016-05-13.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6104fd87f7ec4afe05a1df89>。

② 郑贤章：《佛经的翻译与传抄对汉字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8-22(7)。

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了大量上自曹魏,下至宋元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95%以上,约3万卷,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敦煌写经的发现,也证明当时抄写佛经的普遍性。广大僧侣、写经生和文人墨客大量抄写各类经卷,在更加广泛地传播佛教经典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写经书法艺术的大发展。

唐末以后因雕版大藏经之流行,写经事业逐渐衰微,但历经宋元明清直至今天,传抄经书仍是佛教弘法方式之一。不少寺院僧侣是有名的书法家,以抄经为媒介,接引文人、士子皈依佛教;而士大夫、文人又以书法抄经酬谢助扬佛法,所以产生了不少抄经的书法名作。佛经与书法艺术的紧密结合,不但令书法创作的题材更宽广,内容更丰富,意境更深远,而且提升了佛法的传播速度,扩大了传播范围。

清代寺庙林立,僧伽繁盛,佛教的繁荣发展与帝王的大力推崇和写经宣教行为更密不可分。清朝作为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为了巩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非常重视佛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安抚大众民心的作用。以康熙、雍正、乾隆为代表的最高皇权统治者,不仅大力推行崇佛政策,广建寺庙,而且御笔写经宣扬佛法,祈求国运昌盛和人民安居乐业。康熙御笔抄经有《药师经》《普门品》《金刚经》《陀罗尼经》《仁王经》;雍正御笔抄经有《心经》《金刚经》《古德颂》《证道歌》;乾隆一生所抄各类经文有数百部之多,如《般若经》《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智严经》《法华经》《圆觉了义经》等。上行下效,民间抄经之风更盛极一时。据统计,仅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皇帝御笔写经的数量就有两千余部。^①北京市佛教协会收藏雍正御笔《金刚经》和乾隆御笔《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各一部。

(三) 抄写经典——佛教供养方式的中国化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还反映了佛教供养方式的中国化。“供养”一词源自梵语,又称供、供施、供给、打供,是对佛、法、僧三宝进行心物两方面的供奉而予以资养的行为。佛教的供养早期以财供养为主,后逐渐拓展丰富,形成法供养、行供养,更有四种供养、五种供养、七种供养、十种供养之说。供养佛,大多在佛像前摆设物品以示供养十方法界诸佛菩萨,常用的有“十物供养”: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供养法,是对佛法的尊重和奉行,

^① 乾隆御笔:《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2017年5月13日,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微信号:zhongguojiade。

即佛说百千法门，众生随而信解修行，长养法身，守护大法。《普贤行愿品》中列举了七种法供养：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代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供养僧，即供养出家人，使他们安心修行。在释迦牟尼住世的时代就有“四事供养”之说，即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药品）之供养。

佛教认为，“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对佛陀最好的供养，是受持佛陀所说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书写、读诵和解说佛陀所说的一切法，并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因为法是佛母，佛是由法而成就的，从凡夫到佛的一切断证功德，都是由法而来。法能使人获得智慧、慈悲、神力，能使人成佛。而抄写经书可结法缘，具有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提心供养的某些特点，是法供养的一种独特形式。《金刚经》《药师经》《地藏经》《维摩诘经》《法华经》等诸多大乘经典中，都强调了抄写、受持、读诵和解说经典的意义与功德。如《金刚经》第十五品“持经功德品”云：“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这是释迦牟尼告诉须菩提等诸弟子，说如果有人用无量无边以身布施的功德已经非常大了，但这样的功德也比不上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金刚经》的功德大、利益广。

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佛教徒分外重视法供养，重视抄经的殊胜功德。古代，抄写佛经是很多高僧大德受持经典、修习佛法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福田、增长功德的重要途径。凡抄经之人，往往被视为大功德者，他在书写经典之时，身心清净，安然自若，所得功德无量无边。其手抄经书之所在，就是三宝之所在，佛陀之所在，时刻会受到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的护佑及供养。很多高僧不仅自己抄经，也鼓励居士信徒抄写佛教经典，而且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沐手、焚香、抄写、回向等抄经仪轨。对此，著名律宗大德弘一法师在《庄闲女士手书法华经序》中曾做过阐述：“十法行中，一者书写。考诸使传，魏唐之际，书写经典，每极殷诚。先修净园，遍种树，香草名花，间杂交植，灌以香水。楮生叁载，香气四达。乃至村瓦，悉渥香汤。堂中庄严，旗铃佩，周布香花，每事严洁。书写之人，日受斋戒。将入经室，夹路焚香，梵呗先引，散华供养，方乃书写。香汁合墨，沉檀充管，下笔含香，举笔壮气。逮及书就，盛以宝函，置诸香厨，安于净室。有斯精诚，每致灵感。”从上述记述可以看到，古代佛弟子抄经写经态度之虔诚恭敬，环境之幽雅静谧，仪轨之细腻庄严。抄好的经书要存放于妥当之处加以珍藏供奉，避免褻渎。六朝以来，大的寺院还盛行建造藏经楼珍

藏供奉佛教三藏经典，即写本或刻印本经卷。楼阁内还要置放佛像，与藏经一同供奉。

（四）手抄经书——佛教修行方式的中国化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还反映了佛教修行方式的中国化。佛经讲，佛教有八万四千法门，不同根器的人可以通过不同的法门，脱离苦海到达般若的彼岸。佛法的修行，就是用佛陀教导的方法，来修正身、口、意三种行为。释迦牟尼在创立佛教之初就提出了修行的基本方法——“八正道”。八正道是四圣谛中道谛的具体化内容，意思是消灭烦恼的八种正确方法，即正见、正思、正念、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定。八正道又可以归纳总结为戒、定、慧三学，修这三学就是广义说的佛教的修行。任何法门都要遵循戒、定、慧次第，修佛应从持戒开始。能够持戒就有了定力，因戒而得定，因定而生慧。深信因果，发菩提心，“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然后才能觉悟，才能解脱，才能成就正果。其中，抄经也被视为受持经典、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具有很大的功德，《金刚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中都有相关记述。

《法华经》云：“如果有人受持、读诵、正忆念如是经典，解其义趣，如说修行，当知是人行普贤行，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为诸如来手摩其头。若但书写，则命终时，当生忉利天上，天女作众伎乐而来迎之，乃至为千佛授手，令不恐怖，不堕恶趣，即往生兜率天上弥勒菩萨所，有三十二相大菩萨众所共围绕，百千万亿天女眷属。以此功德利益，智者应当一心自书、使人书、受持、读诵、正忆念、如说修行，能具无边胜福。”无著菩萨也认为抄经有五种功德：可以亲近如来；可以摄取福德；亦是赞法亦是修行；可以受天人等的供养；可以灭罪。

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汇融通，形成汉传、藏传和南传三大语系佛教。随着佛教的发展，其修行理论也早已超出了八正道的范围而日趋复杂。小乘佛教的修行可以概括为“三十七道品”，即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等。大乘佛教主要修“十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般若、方便、愿、力、智等到达彼岸的十种方法，也称为十度。

汉传佛教日益重视修行与生活的结合，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强调修行应不离生活，生活亦不离修持，所谓“即生活即修持”。修行的方式方法因人而异，种类繁多，如四念处、般舟三昧、闭关、持午、参学、化冬、普说、小参、普参、经行、跑香、行脚、苦行、密行、共修、禁语、朝山、打七、止静，以及烧香点灯、供花献果、诵经拜佛、持诵佛号、称念偈诵、布施供养等，都是修行。抄经的方式也得到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广受重

视的修行方式,而且与传统书法艺术紧密结合,形成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抄经最初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后来逐渐与中国高雅的书法艺术相结合,成为书法艺术创作的重要途径和门类,也成为佛教信众非常殊胜且简单易行的修行法门。

佛教把禅作为统一心境、断除杂念、降低我执、减少烦恼、获得涅槃的重要方法,认为行住坐卧皆能入定,语默动静无不是禅。沐身手、平心气、展净纸、研香墨、书小楷——抄经不仅能传佛法、培福报、增智慧,而且在笔与纸的接触、心与手的协调中,由身动而至心静,同样也能体会到禅定的喜悦,是典型的动中禅。作为写经之人,苏轼对禅与书法之间的关系深有体悟:“必墨以忘乎纸,纸忘乎笔,笔忘乎手,手忘乎身,身忘乎心,而于字始臻乎神化巧妙之境地。”康有为也曾妙论二者关系:“吾谓书法亦犹佛法,始于戒律,精于定慧,证于心源,妙于了悟,至其极也,亦非口手可传焉。”弘一大师认为:“抄经不同一般书法,每一步骤皆是修行,藉专注于抄写佛经,达到身心安泰,一心不乱的境界。专注一心,没有妄念和烦恼。抄经故是一项很好的修持。”乾隆在其六旬万寿来临之际,曾经御笔亲书《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也是为了表示对佛祖的崇尚和修持佛法的信念,希望能如文殊菩萨一样受到释迦牟尼点化,开发智慧,提高悟性,最终修炼成佛。^①可见,在宁静诗意的书法妙境中修禅,在禅的宁静境界中感悟书法之道,潜心向佛,修身养性,正是王羲之、张旭、柳公权、苏轼书、赵孟頫、欧阳询、弘一法师等古今大家名流,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王选择抄经的初衷之一。

古人重视抄经,还总结形成了一套抄经的程序和礼仪禁忌,主要包括:备好笔、墨、纸、墨碟;洁净双手;端身正坐,收摄身、口、意;焚香,传达诚意,供养三宝;双手合掌,三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诵念一遍“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静心抄经,字体要工整,忌随心所欲信笔挥毫,忌字迹杂乱,忌错字;抄经完毕,双手合掌,念诵一遍“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将写经的功德分享给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同享,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具正知见,乃至究竟成佛。

雍正自幼接受严格教育,《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称其“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源,旁彻性宗之旨。天章潜发,立就万言”。书法艺术方面,在40余年的皇子生涯当中,习字作书为日常必修功课,无论京居还是出巡,从无间

^①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乾隆御笔:度一切诸佛境界智严经》,2017年5月13日,微信号:zhongguojiade。

断。他在位 13 年，“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无更多闲暇专门抄经练书法，因而存世作品远不及康熙、乾隆多，但他是清代皇帝中书法造诣较高的一位。

（五）纸质经折——佛教经书材质与装帧方式的中国化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还反映了佛教经书材质与装帧方式的中国化。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使用的是贝叶质、梵夹装经书。当时造纸技术还没有传到印度，古印度人就用贝叶书写文字，记录传说、故事、诗歌和历史、哲学等内容，佛教徒们也在贝叶上刻写佛教经文、绘制佛像。据《佛本行集经》记载：“时彼天王，知如来意，即持笔墨及多罗叶，往诣佛所。”可见，在释迦牟尼住世的时代，贝叶已经被用作书写材料。他涅槃后，其弟子们举行了 5 次大规模的结集活动，将他宣讲的教法，刻写在贝叶上，称为“贝叶经”。贝叶经完整记录了佛教原典，成为后来佛学的基础。

贝叶经的装帧形式为“梵夹装”，即夹板式以穿绳绕捆的装帧形制。它是将经过处理、裁剪整齐、刻写好经文的贝多罗树叶，依次摞成一摞，在每摞的上下各夹配一块与经叶大小长短相同的竹片或木板，于夹板中段，隔开一定距离，连同经叶垂直穿两个小圆洞，然后用绳索穿缀绑缚，一部梵夹装的经书就算装帧完毕。隋代杜宝在《大业杂记》中写道：“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而厚大，横作行书……牒牒然，今呼为梵夹。”《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表明梵夹装，系专指古印度用梵文书写的贝叶经的装帧，所以也称之为“贝叶装”。随着佛教的传入，贝叶经及梵夹式装帧方式也传入中国。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西行求法返回长安，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即为梵夹装经书。

中国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于印度，先后采用过竹、木简、版牍、缣帛和纸张。用这些材料制作的书籍，不适宜梵夹装。由于制作材料的进步和翻阅方便的需要，梵经汉译之初多采用卷轴装的装帧形式。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卷轴装又称卷子，它是沿袭古代帛书形式，把纸张接成长条，在卷尾黏上木轴，以便于展收。文字多的，装成长卷，简短的则使用单叶纸张，称为叶子。梵夹装仅在傣文、藏文、蒙文佛经制作中有部分模仿使用。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人们对于佛经的使用变得越来越频繁。基于对佛法的尊重，诵经时端坐正念，“易翻便诵”成为佛经装帧的重要因素，而卷轴装则难以满足这种使用需求。唐代后期，更为方便的装帧形式“经折装”应运而生。元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舒卷之难，因而为折。”其装帧方法是将长卷的经纸，按一定行数，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前后

加上硬板封面而成。在清代以前,经折装一直是中国佛经装帧的主要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书籍的外观开始由卷轴装向方册装转变。

经折装是借鉴印度梵夹装的优点,对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卷轴装的一种改进。其形制构思巧妙,处处立意为先,在吸收梵夹装造型特征的同时,也保留了梵夹装的造型内涵。封面、封底和中间的夹页设计象征着佛教三宝——“佛、法、僧”,同时也象征着“戒、定、慧”无漏三学。^①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清代宫廷经折装的代表。其特点是在一般经折装的基础上,每折四周加了镶边,形成平开册页式。其板式装帧华丽美观、精致庄严:卍寿纹织锦书衣,吉祥纹饰构图精巧独特、寓意深刻,色彩搭配高雅庄重,黄底黑字题签端庄醒目。扉画“佛陀说法图”布局巧妙、色彩缤纷、祥云缭绕,人物形态栩栩如生。拖尾画韦陀与四大天王表情夸张生动,形象威武,气势雄壮,中国传统吉祥文化与佛教文化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三、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价值

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物,距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作为佛教中国化的阶段性成果,它承载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和本土化的历史,展现着清代佛教经典的功能与价值。时过境迁,在21世纪,我国已经跨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它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价值。

一是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传达的孝亲感恩思想,对新时代孝文化的传承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特点,感恩、责任、担当,孝所蕴藏的要素,不仅是一个人正心、修身、齐家的行事依据,更是社会和谐所赖以维系的价值之核。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在孝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是保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基础,是我们不能、也无法割舍的重要文化传统。立足

^① 胡中青:《经折装汉文佛教典籍的形制与审美》,设计艺术研究,2012(6):92。

新时代,挖掘、借鉴、吸收传统孝道中与现代文化精神相契合的因素,推动传统孝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时代生命力,孝文化就会成为代际沟通、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润滑剂,社会道德建设就能获得坚实稳固的支撑。

二是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继承了中国书法艺术之美,是书法艺术家和广大书法爱好者不可多得的范帖经典。雍正自幼即受到严格的汉文化教育,国学修养很高,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其擅长书法。《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称其“书法遒雄,妙兼众体”。其书法早年临学晋、唐、宋、元各家之风,多取法米芾、赵孟頫二家,并承迎父皇,摹学董书,逐渐形成刚柔相济、潇洒自如、华贵大方的艺术风格,深厚功底不仅超越很多书法名家,对乾隆乃至后世书风亦产生一定影响。田忠彦在《浅说清代盛世帝王书法》一文中评价说:“康熙的字逸美,雍正的字放达,乾隆的字甜丽。相比之下,雍正的字个性更为舒展,意趣表达更为自然。”其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行楷墨书,结体紧凑,畅朗娴熟,文雅遒劲,行笔疾迟有序,气脉贯通,堪称书法艺术与佛教经典珠联璧合的珍品,是历代皇帝御笔书法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对今天的广大书法艺术家、爱好者以及写经抄经的佛教信徒而言,更是一部欣赏与临习不可多得的极佳范本。雍正抄写于康熙五十三年同名作品,2009年曾以4032万元的价格拍卖成功,刷新了其个人及清宫御笔类作品成交纪录,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该件文物艺术价值之高。

三是雍正亲手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当时和今天的佛教四众弟子传播正法、正信正行树立了榜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也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佛教经书之一,是中国禅宗所依据的重要经典之一,为出家、在家佛教徒早晚课最常颂持的经典,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具有深远影响。它主要讲述大乘佛教的空性与慈悲精神,以金刚比喻智慧有斩断烦恼的功用,告诉世人不住相修行,就能够消除心灵负担,拥有独立之心,减少无谓妄念,解脱烦恼,明了宇宙人生真实。作为一代帝王和佛教居士,雍正亲手书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仅助推了佛教经典的传承和佛教的广泛传播,对引领佛教四众弟子信教先爱国、学佛先做人,以法为依、依教奉行,契理契机地开展弘法利生活动,充分发挥佛教文化抚慰人心、涵育道德的独特功能也具有积极意义。跨入新时代,佛教界仍然要坚持正信正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正信,就是皈依三宝、深信因果、树立正知正见。正行,就是以戒为师、勤修三学、觉悟解脱,就是护持三宝、敦伦尽分、奉公守法。只有坚持正信正行,才能克己慎行,正己化人,努力发挥佛教积极作用,更好地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

综上所述,雍正手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作为中国佛教写经历史和文化的代表,从多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佛教中国化的进展与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研究

价值。对其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挖掘《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传承雍正知孝行孝尽孝的精神,有助于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探寻新时代佛教中国化、时代化和现代化的路径,更好地推动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发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国家繁荣富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六朝佛教造像对朝鲜半岛及日本的影响》

费泳著,中华书局,2021年4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及其造像由中国传入海东地区的关键时期。以往由于佛教实物的缺乏,无法验证古文献记载中六朝佛教文明的辉煌,导致对朝鲜半岛、日本早期佛像来源的认识,多注重北朝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南朝佛教造像的新发现及相关研究的深入,有条件进一步论证在汉传佛教文化圈形成过程中南六朝的主导性作用。本书对中国与海东地区佛教造像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着重探讨东晋、南朝的佛像样式特征,及其对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日本飞鸟白凤时期造像的影响和传播路径,确立六朝在东亚佛教艺术中的先进地位。